

##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

羅麗馨\*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這場戰爭，自1592年4月12日至1598年12月20日，前後約六年八個月。其間雙方曾進行和談，但無結果。

豐臣秀吉的對外態度是，強調其已統一日本，日本是神國，要求琉球、高山國、印度、菲律賓等國向日本朝貢。侵略朝鮮，則與其欲征明有關。他在1590年回覆朝鮮國王的國書中，已表明欲征大明四百餘州，願顯佳名於三國(中、日、朝)的野心。對朝鮮要求「先驅入朝」，完全將朝鮮看作是屬國。秀吉出兵朝鮮的原因有各種說法，但朝鮮拒絕作為日本入明的先導，應是最直接的動機。

日軍攻陷漢城後採八道分治，在各佔領地施行同化政策，令諸將在釜山與漢城間建造行營和「繫城」。1593年，戰事失利加上與明和談，日軍退至半島南海岸後，隨即營建十八個倭城作為軍事據點，欲長期駐留。1597年再入侵朝鮮，此次目標僅在占領朝鮮南部，但亦立即在此築城，永久支配朝鮮的政策不變。

這場侵略朝鮮的戰爭，江戶時代有正反兩面的評價。幕末面

---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聯絡地址：臺中市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250 Kuo Kuang Rd., Taichung 402, Taiwan R.O.C)

對海防問題，征服朝鮮的意識增高。近代以後進行對外擴張，這些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致使秀吉侵略朝鮮這場戰爭更受肯定。明治政府則加以宣傳、利用，並將其作為殖民朝鮮、侵略亞洲的先導。這種「侵略朝鮮史觀」，直至二次大戰後才改變，日本歷史學界也做各種檢討。

關鍵詞：神國、繫城、倭城、侵略朝鮮史觀

## 一、前言

豐臣秀吉(1537-1598)侵略朝鮮這場戰爭，自文祿元年(1592)四月十二日日軍在釜山登陸，至慶長三年(1598)十二月二十日全軍撤退止，前後約六年八個月。其間雙方曾進行和談，但無結果。

這場戰爭，中國稱為「萬曆朝鮮之役」。朝鮮稱此役為「壬辰、丁酉倭亂」，但壬辰倭亂持續至第二年癸巳年，因此也稱「壬癸之變」、「辰巳之變」。辰是龍，巳是蛇，所以也稱「龍蛇之變」。<sup>1</sup>至於日本，戰爭發生當時，各種文書、記錄是以「唐入」、「高麗陣」、「朝鮮陣」稱之。江戶時代，開始稱「征韓」或「朝鮮征伐」等。幕末由於欲殖民朝鮮，「征韓」、「朝鮮征伐」的意識更濃。因受1894年「日清役」和1904年「日露役」稱呼的影響，此戰爭也稱「朝鮮役」或「文祿慶長之役」。其他也有用「秀吉征伐朝鮮」或「秀吉出兵朝鮮」。<sup>2</sup>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後，多用「文祿慶長之役」。1940年代盛唱「大東亞共榮圈」，秀吉侵略朝鮮有很高的評價。<sup>3</sup>以豐臣秀吉發動戰爭，是要征服大明及顯佳名於三國(中、日、朝)而言，稱「征伐朝鮮」似乎太狹隘。稱「出兵朝鮮」似亦無法反映秀吉真正的野心。用「文祿慶長之役」，大約可以有較廣度的觀察。

這場戰爭牽涉中、日、韓三國，三國都有史料記載，但多半是有關戰事的進展、和談交涉、朝鮮義軍抗日等。近現代日、韓學者研究頗多，<sup>4</sup>但大致仍以其本國立場作觀察。此役之後，東亞國際情勢有相當大變化。戰後朝鮮半島殘破，人口銳減，土地荒廢，社會經濟陷於危機。日本因軍士大量死亡，及耗費龐大軍需物質，國內經濟亦殘破，<sup>5</sup>最後由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幕府。中國則因滿州崛起，終至亡明建立清朝。

<sup>1</sup> 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經略》(東京：白揚社，1939)，頁4。

<sup>2</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会社そしえて，1982)，頁16-17。

<sup>3</sup>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8)，頁59。

<sup>4</sup>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24-88。

<sup>5</sup> 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328-330。申旻用，《再造藩邦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卷4，頁83上載：「而王京以南數千里之區，幾乎骨白而燐青矣。」

本論文踏襲前人的研究成果外，主要從秀吉的對外態度、對朝鮮發動戰爭的原因、在朝鮮的佔領政策等三方面作分析，以期明瞭秀吉的對外思維和近世日朝兩國的關係。

## 二、對外態度

豐臣秀吉的對外態度，依國家不同所採態度亦不同。如視琉球、朝鮮為屬國；葡領印度、菲律賓需朝貢始得貿易，對高山國亦要求朝貢，若不朝貢將出兵征討；對大明則欲征服，完全無視東亞以大明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此外，豐臣秀吉以日本是神國，反對傳教士傳教。宣稱自己是日輪之子，有治天下之命，這是他的對外思維。下面以琉球、葡領印度、菲律賓、高山國、大明為例說明之。

### (一)琉球

天正十六年(1588)八月，秀吉命島津義弘(1535-1619)遣使赴琉球。《島津國史》載：「天正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公(島津義久)遣大慈寺(龍雲)齋書遺琉球王曰：方今天下一統，海內向風。而琉球獨不供職，闕白方命水龍，且屠而國。及今之時，宜其遣使謝罪，輸貢修職，則國永寧矣。茲特告示，因贈扇子百本，用陳微忱。」<sup>6</sup>即島津義弘遣大慈寺僧龍雲赴琉球，要求琉球國王遣使謝罪、朝貢，如此則國可永寧。天正十七年(1589)八月，琉球國王尚寧遣天龍寺僧桃菴和安谷屋親雲上(尚寧王岳父)為正、副使至日本。琉球國王的表文如下：

承聞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下塵，歸伏幕下。加之及高麗、南蠻亦偃威風，天下太平，橐弓撫四夷之謂乎。吾遠島淺陋小國，雖難草一禮。島津義久公使大慈寺西院和尚，蒙仰之條，指上天龍桃菴和尚，

<sup>6</sup> 山本正誼，《新刊島津國史》(鹿兒島：鹿兒島縣地方史學會，1972)，卷20，「貫明公下」，頁157下。義弘傳命龍雲是8月16日，龍雲赴琉球是11日。此日期記載有誤。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1914)，正編第一，頁54-56。

明朝之塗物，當國之土宜，輕薄之進物，錄于別楮，為遂一禮也。恐懼不宜。<sup>7</sup>

琉球國王祝賀日本統一，進貢明國漆器、琉球方物。秀吉給琉球國王的答書有兩種保存下來。其一為《武家事紀》的記載：

抑日域事，至八荒之諸島，無不屬本意者。三韓須納懇歡之條，許容儀涉思惟候，所詮不經歲月而令渡海，可振威風於大明之念望，豈空乎。其時續舟具被添干戈者，自他之覺最也。猶天龍桃庵東堂，島津義久可演說，仍恐恐不宣。<sup>8</sup>

其二為《續善隣國寶記》的記載：

抑本朝六十餘州之中，撫兆民施慈惠，而不遺尺土寸地，悉歸掌握也。雖然與異域不講交，則為遺憾。祇今得貴國之奇物，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願也。茲先得貴國使節遠邦奇物，而頗以歡悅矣。……自今已往，其地雖隔千里，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sup>9</sup>

《續善隣國寶記》附的日期是天正十八年(1590)仲春(二月)二十八日，《武家事紀》附的日期是天正十七年仲夏(五月)二十八日，此日期有誤。《武家事紀》有「三韓須納懇歡之條」、「振威風於大明之念望」、「續舟具被添干戈」等，措辭強烈。反觀《續善隣國寶記》中，「欲弘政化於異域」、「以異邦作四海一家」等，則用詞委婉。琉球是明朝的藩屬國，要其協助證明，桃菴必然反對。《續善隣國寶記》收的答書，可能是和琉球有貿易利益的島津氏從中斡旋改寫的。<sup>10</sup>

天正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島津義久(1533-1611)給琉球的書信中，有「天龍寺和尚至京都，所請事件悉見許與，珍重珍重。關白殿下既克小田原城，武暢八州，威振四海。遐陬僻壤獻方物，賀戰勝，梯山航海，靡不畢至。

<sup>7</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近藤圭造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21冊，頁33。

<sup>8</sup> 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編，《武家事紀》(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1916)，卷30，「古案·豐臣家上」，頁481下。

<sup>9</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3-34。

<sup>10</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61-63。

王其速獻方物及樂工，茲特告示。」<sup>11</sup>《島津國史》載：「十九年秋八月二十一日，琉球王遺公(義久)書曰：聞關白克八州，爰遣建善寺大龜和尚、茂留味里大屋子賀之。以敝邑困悴之故，不能輸方物，且獻樂工，聊以為儀，公其為我辭矣。」<sup>12</sup>即義久於信中要求琉球國王獻方物及樂工，但琉球王以其國困悴，請求免獻。天正十九年(1591)十月二十四日，義久又給琉球書信，謂：「關白將伐朝鮮，徵兵薩摩及貴國。曰：宜合兩國眾，滿一萬五千。寡人(義久)以貴國素不習軍事，不責送兵。此間徵發如數，因告貴國，宜輸七千人，十月之糧，明年二月以內至坊津，然後達于高麗。又自今月十日，諸侯築行營於肥州名護屋，王以絕島故不及會，宜輸金銀米穀之屬以助役。」<sup>13</sup>關白將征伐朝鮮，向薩摩和琉球徵兵。義久以琉球不習兵事，不責其送兵。但九州諸國均至肥州協助建造行營名護屋城，因此要求琉球輸金銀米穀助役。十二月十九日義久再次給琉球書信，曰：「綾船遲緩，謹及敝邑，宜速遣之。名護屋行營，專屬九州人，因命貴國助役事，已悉前書，此尤不可愆期。」<sup>14</sup>對於琉球的助役，要求不可延誤。

日本與琉球的交涉由島津氏擔任，但島津氏與琉球間有密切的貿易利益關係。由島津氏給琉球的書信，雖無法完全肯定即為秀吉的意思，但仍可推測秀吉對琉球的態度。如「王其速獻方物及樂工」，此乃視琉球為朝貢國。「關白將伐朝鮮，徵兵薩摩及貴國」、「宜輸金銀米穀之屬以助役」，此為將琉球看作是國內諸侯，而加以課賦役。天正十年(1582)六月八日，秀吉到播州姬路，當時龜井茲矩(1557-1612)向秀吉表示，他在國內無所望，只希望得到琉球。秀吉從腰間取出團扇，手書「龜井琉球守殿」賜給他。文祿元年(1592)征伐朝鮮時，龜井茲矩向秀吉要求分兵征伐琉球。秀吉以兵力不足，若琉球戰事拖延，將妨害朝鮮的征討，因此命龜井渡海朝鮮，結果並未對琉球用兵。<sup>15</sup>由此事件可以推知，琉球臣屬與否，對秀吉而言，不如征服朝鮮重要。

<sup>11</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64-65。

<sup>12</sup> 山本正誼，《新刊島津國史》，卷20，「貫明公下」，頁159上。

<sup>13</sup> 山本正誼，《新刊島津國史》，卷20，「貫明公下」，頁159上-下。

<sup>14</sup> 山本正誼，《新刊島津國史》，卷20，「貫明公下」，頁159下。

<sup>15</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30-31；68。

## (二) 葡領印度和菲律賓

天正十八年，葡萄牙駐印度臥亞總督派遣傳教士 Valignano (1539-1606) 為使者，隨伊東祐益等一行至日本，年底到達日本，翌年正月謁見秀吉。<sup>16</sup> 當時 Valignano 攜來總督給秀吉的書信中，主要是感謝秀吉保護傳教士，給予傳教士傳教上的方便。因傳教士之請，所以送書殿下，派遣謝恩使，並請求今後更加眷顧他們。<sup>17</sup> 對此，秀吉回信如下：

本朝者邦域六十有餘，積年亂日多，而治日少。故凶徒好奸謀，群士作黨與，而不得服從朝命。予也壯歲之日，曠旭嘆惜之。修身之術，治國之要，深謀遠慮。而以仁明武之三，撫養諸士，哀憐百姓，正賞罰，定安危，由此久不歷星霜，而天下混一，如安盤石。及異邦遐陬，亦莫不來享。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吾邦已晏然。雖然一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以其便路，可赴其地，何作遠近異同之隔乎。夫吾朝者神國也，此神在竺土喚之為佛法，在震旦以之為儒道，在日域謂諸神道。若是欲知神佛深理，隨懇求而可解說之也。如爾國土，以教理號專門，而不知仁義之道，此故不敬神佛，不隔君臣，只以邪法欲破正法也。從今以往，不辨邪正，莫為胡說亂說。彼伴天連之徒，前年至此土，欲魔魅道俗男女，其時且加刑罰。重又來于此界，欲作化導。則不遺種類，可族滅之，勿噬臍。只有欲修好於此地之心，則海上已無盜賊艱難，域中幸許商賈往還。<sup>18</sup>

<sup>16</sup> Valignano於1579年至日本，謁見織田信長，得到傳教許可，並勸九州大友、大村、有馬三大名遣使至羅馬。1582年，他隨伊東滿所等四人從長崎出發，途中至印度哥亞(Goa)，被任命為當地管區長。1590年伊東從羅馬回日本，他隨伊東再至日本。1591年謁見秀吉，希望取消禁教令不果，再回印度。1598年第三次至日本，1601年回哥亞。武內博編，《來日西洋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1989)，頁26-27。

<sup>17</sup> 總督寫此信時，尚未聽到秀吉已頒布禁教令。此書信送達日本時，耶穌教在日本的情勢已改變。秀吉於1587年6月19日於征服島津後的歸途，在博多宣佈禁教、驅逐傳教士。岡本良知，《豐臣秀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頁14。秀吉的禁教並不徹底。

<sup>18</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收入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

此信函附記的時間是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秀吉表示其已統一日本，遠近各國皆來朝貢，東西南北唯命是從。其有征明之志，不久可以派兵至中國，此易如反掌。又，日本是神國，前年伴天連(傳教士)至日本，迷惑道俗男女，已加以刑罰。希望印度與日本修好(朝貢)，日本也允許商賈往來。

秀吉在給葡領印度總督書翰要求修好(實即朝貢)的同時，天正十九年九月十五日也給菲律賓如下大約相同內容的書信。

予也際誕生之時，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壯歲領國家，不歷十年而不遺彈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統一也。繇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欽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如其國者，未通聘禮，故先雖欲使群卒討其地，原田孫七郎以商船之便，時來往此。故紹介近臣曰：某早早到其國，而備可說本朝發船之趣，然則可解辨獻筐云云。不出帷幄而決勝千里者，古人至言也。故聽禍夫言，而暫不命將士。來春可營九州肥前，不移時日，可偃降幡而來服。若匍匐膝行於遲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sup>19</sup>

即說明自己出生時，出現可以治天下之奇瑞。今全國統一，三韓、琉球等皆來朝貢。其欲征伐大明，此乃天授。本欲率兵討伐菲律賓，因原田孫七郎之建議，暫不出兵。若不來朝貢，必征討之。文祿元年菲律賓總督 Gomez Perez Dasmarias 派船長 Lope de Llano 和道明會傳教士 Fray Juan Cobos 為使節至日本。菲律賓總督的回信中，只談論西班牙國力強大，欽羨秀吉雄才大略統馭一方，睦鄰脩好柔遠通商是西班牙國王的期望。兩國都是大國，結誼是第一盛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sup>20</sup>對秀吉修貢的要求，避而不答。因原田孫七郎的勸說，秀吉再給菲律賓第二封書信，信中再次申明前意，促菲律賓來服。<sup>21</sup>但 Cobos 的乘船在歸途中遇海難，秀吉此信的正本並未送達

---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頁423-425。

<sup>19</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29。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79。秀吉給菲律賓的三封文書，參見村上直次郎，〈呂宋の入貢を促したる秀吉の書翰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36卷第5號(東京，1925.05)，頁394-391。

<sup>20</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32-433。

<sup>21</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92-95。Crasset認為此書信更尊大、傲慢。參見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96。

菲律賓總督。同行喜右衛門的船隻，則於文祿二年(1593)五月二十二日抵達馬尼拉。菲律賓總督 Luis Perez Dasmaringas 因喜右衛門勸說，再派船長 Goncalvez de Carvalho 和聖方濟會傳教士 Pedro Baptista、Goncalo Garcia 等與原田一起赴日。<sup>22</sup>秀吉在名護屋接見 Baptista(秀吉於8月回大坂，接見 Baptista 應在此之前)，告訴他們，他在胎內有日輪(太陽)入胸瑞相，占者預言他有終為世界之王之兆。其平定國內之亂，大名皆服從。先已戡定朝鮮，支那請和，並要支那皇女奉侍日本天子。惟此約定未能實現，因此擬再出兵征伐支那。呂宋若早日服從則無事，不服從則立刻發兵征討。Baptista 則以 Cobos 遇船難未能復命，要求秀吉再次遣使送書，他則願意和其他傳教士作為人質留在日本。<sup>23</sup>因此秀吉第三次給菲律賓書信，此書信於文祿三年(1594)四月下旬送達馬尼拉。內容與前兩次大同小異，反覆其豪言壯語外，並言及日、明議和之事，並請告訴西班牙王(Felipe II)派一有地位的人來，如此可以使兩國的友誼更堅固。<sup>24</sup>菲律賓的答覆，首先是報告總督 Gomez 已死，其次言西班牙版圖廣大，菲律賓其地雖小，仍不甘受他國羈絆。最後，唯希望以對等關係建立永久邦誼。<sup>25</sup>慶長二年(1597)七月二十七日給呂宋總督 Francisco Tello de Guzman 的文書，則強調日本是神道國家，反對傳教士傳教。<sup>26</sup>

秀吉給臥亞總督和菲律賓總督的書信中，都表明希望和兩國修好、結友誼。但此修好、結友誼並非對等，而是臣屬的朝貢關係。尤其對菲律賓，若不朝貢，則將出兵征討。其次，天正十九年給兩國的書信，均表示要征伐明國，此易如反掌，是天授。給菲律賓第二、第三封信時，日本和明朝正處於和談中，但秀吉仍於信中表示渡明及至呂宋是易事。再者，他也以其出生時有奇瑞，隱喻自己有治天下之命，更稱日本是神國，這是秀吉的

<sup>22</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35-436、437。Luis Perez是Gomez Perez之子，Gomez在航行Malacca途中遇害，Luis繼任總督。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15。

<sup>23</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38-439。

<sup>24</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12-114。

<sup>25</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17。

<sup>26</sup> 松田毅一，〈慶長二年呂宋国宛豊臣秀吉書状〉，《日本歴史》，第164號(東京，1962.02)，頁40-41。

對外思維。至於菲律賓，則只想永結友好、傳教、貿易。秀吉以原田喜右衛門送書菲律賓，但喜右衛門是往來呂宋的貿易商人，孫七郎是他的伙計，他們為求貿易利益，並未傳達秀吉真正的意思。<sup>27</sup>

### (三)高山國

秀吉對台灣的野心，在文祿二年十一月給高山國文書之前一年，菲律賓總督和明朝即已聞知。文祿元年年底原田喜右衛門與 Cobos 一行至菲律賓，Cobos 搭乘的船隻沉沒，喜右衛門則於文祿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入港馬尼拉。六月一日菲律賓方面對秀吉的文書商討對策時，曾詢問同行的明朝人 Antonio Lopez。Lopez 談及他在平戶由中國基督教徒 Sangley 聽到，日本國王將委託一日人佔領台灣島之事。<sup>28</sup>即在他們到菲律賓前一年，已聽到秀吉計畫征伐台灣的傳言。徐光啟(1562-1633)，〈海防迂說〉載：「而先是海商陳申暨許儀後，先後遺問書于我，告以秀吉謀入犯，東南稍戒嚴。」<sup>29</sup>《天下郡國利病書》載：「萬曆壬辰歲(1592)，倭犯朝鮮，有侵雞籠淡水之耗，雞籠密邇澎湖，當事者集議不宜棄。乃設官兵，先據險戍之。」<sup>30</sup>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曰：「往年平酋作難，有謀犯雞籠淡水之耗，當事者始建議戍之。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sup>31</sup>徐學聚(1583-?)，〈初報紅毛番疏〉曰：「關白時，倭將欽門墩統舟二百，欲襲雞籠，據澎湖窺我閩粵。幸先事設防，謀遂沮。」<sup>32</sup>知秀吉欲侵雞籠，據澎湖，進窺閩粵，

<sup>27</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05-109。菲律賓總督第二次的回信，提出通商同盟條約，但終未締結。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39-440。

<sup>28</sup> 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史學雜誌》，第38卷第8號(東京，1927.08)，頁753。

<sup>29</sup> 徐光啟，〈海防迂說〉，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8)30冊，卷491，頁324。

<sup>30</sup> 顧炎武輯，《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93，「福建3·澎湖遊兵」，頁48上下。

<sup>31</sup>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29冊，卷479，頁454。

<sup>32</sup> 徐學聚，〈初報紅毛番疏〉，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26冊，卷433，頁628。

而明則派兵和船隻在沿海加強防備。明朝得知秀吉謀犯明的消息，是來自陳申和許儀後的報告。陳申是海商，許儀後是島津氏的藩醫。<sup>33</sup>

秀吉在與呂宋交涉的同時，亦送書高山國促其入貢。高山國即台灣，當時只有大陸移民居住在島上西部和北部，另外還有一些土蕃部落分散各地。給高山國的文書日期是文祿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內容如下：

予際欲處慈母胞胎之時，有瑞夢。其夜已日光滿室，室中如畫，諸人不勝驚懼。相士相聚占筮之曰：及壯年，輝德色於四海，發威光於萬方之奇異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異邦遐邇嚮風者，忽出鄉國，遠泛滄海，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爭先而服從矣。朝鮮罔者，自往代於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約。況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謀，此故命諸將伐之。國王出奔，國城付一炬也。聞事已急，大明出數十萬援兵，雖及戰鬥，終依不得其利，來使於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繇之築數十ヶ(個)城營，收兵於朝鮮域中慶尚道，而屢決真偽也。如南蠻琉球者，季季獻土宜，海路通舟車，而仰我得光。其國未入幕中，不庭之罪彌天。雖然不知四方咸享，則非其地疎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發船，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攻伐之。生長萬物者日也，枯渴萬物亦日也，思之，不具。<sup>34</sup>

秀吉此信仍是強調自己出生時出現奇瑞，其平定海內，遠近異邦爭先來服。征討朝鮮是因朝鮮久背盟約，在其欲征大明時又有反謀。結果朝鮮國王出奔，京城陷落。大明雖出數十萬援兵助之，仍失利遣使乞降。南蠻、琉球年年來獻，今以原田氏(喜右衛門或孫七郎)為使者，若不來貢，將出兵征伐。

秀吉是否真想用兵高山國，不得而知。明方面主要根據海商和居住日本的中國人提供消息，並加強福建沿海的防備。秀吉或許是因明已有防備，遂不再派遣使節至高山國。與高山國的交涉僅此一文書，但並未送出，今

<sup>33</sup> 許儀後，原名丘福旺，福建人。大關定祐，《朝鮮征伐記》(東京：國史研究會，1916)，第2，頁72。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修正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卷15，「二十四年五月乙丑條」，頁606下。

<sup>34</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頁490-491。另參見村上直次郎，〈豐臣秀吉フイリッピン諸島并に臺灣の入貢を促す〉，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富山房，1905)，頁155-156。

仍保存在前田侯爵家。<sup>35</sup>

#### (四)大明

據賴山陽(1780-1832)《日本外史》載，天正五年(1577)秀吉曾對信長言：  
君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雖積功累勞未所報。中國若定，願以  
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下九州。若下九州，願賜其一歲之入，蓄  
糧造舟，渡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則用朝鮮之兵  
以入明。庶幾倚君之威靈，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宿志。信  
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sup>36</sup>

因此有秀吉征明之志始於天正五年之說，但此說並無實據。一般認為應始於天正十三年(1585)，此年九月三日秀吉給家臣一柳末安的文書中有「唐國迄」之語。<sup>37</sup>

天正十四年(1586)七月秀吉開始征伐九州，其後於八月五日給安國寺惠瓊(1539-1600)和黑田孝高(1546-1604)等的朱印狀，<sup>38</sup>天正十五年(1587)十月十三日給諸將的朱印狀，<sup>39</sup>十月二十一日給相良宮內大輔的朱印狀，<sup>40</sup>天正十六年正月五日給小早川隆景(1533-1597)的朱印狀，<sup>41</sup>卯月(四)六日諭關東、奧羽諸侯的書狀，<sup>42</sup>天正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富田知信(1594-1599)、淺野長政

<sup>35</sup> 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台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38卷第8號，頁753。

<sup>36</sup> 賴山陽，《邦文日本外史》(東京：京文社，1931)，15卷，「豐臣氏上」，頁711。

<sup>37</sup> 此文書內容，參見岩沢愿彦，〈秀吉の唐入りに関する文書〉，《日本歴史》，第163號(東京，1962.01)，頁73。

<sup>38</sup> 《毛利家文書》3，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8，950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230。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76、78。

<sup>39</sup> 《鍋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鍋島信生宛朱印狀〉，頁37右。

<sup>40</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171。

<sup>41</sup> 《小早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覆刻)，家わけ第11，491號，〈豐臣秀吉直書〉，頁464。

<sup>42</sup> 《白川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4，〈白川義親宛富田一白書狀〉，頁左。

(1547-1611)向伊達政宗(1567-1636)傳達秀吉討滅會津意向的連署狀<sup>43</sup>二十日淺野再給伊達的書狀<sup>44</sup>都有「唐國まで」、「唐國迄」等文字。天正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山中橋內給增田長盛(1545-1615)的書狀，則有來春「唐入」二字。<sup>45</sup>天正十五年在征薩摩的歸途，五月二十九日給夫人北政所的書信，甚至有「余生存中必加唐土於我版圖」<sup>46</sup>之文句。至天正十九年，所謂「唐入」(征伐中國之意)的朱印狀和文書更多，如八月二十三日秀吉的近臣石田正澄(1556-1600)給相良賴房(1574-1636)的文書<sup>47</sup>，二十四日北條氏直(1562-1591)給高野山高臺院的文書<sup>48</sup>，九月三日給松浦鎮信(1549-1614)的朱印狀<sup>49</sup>，九月十六日藤堂高虎(1556-1630)的文書<sup>50</sup>，十月七日仙石曾繁的文書<sup>51</sup>，十二月八日的朱印狀等。<sup>52</sup>文祿元年正月五日秀吉給諸將的捷書<sup>53</sup>，同月秀次給吉川廣家(1561-1625)的朱印狀<sup>54</sup>，二月二日聖護院門跡給吉川廣家的文書<sup>55</sup>及〈證明出陣捷遵奉起請文案〉<sup>56</sup>都可以看到秀吉決定證明，並積極作準備的文字。給外國的文書也可看到他欲征伐明國的心志，如天

<sup>43</sup> 《伊達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覆刻)，家わけ第3，440號，〈淺野長吉富田一白連署狀〉，頁564。

<sup>44</sup> 《伊達家文書》1，449號，〈淺野長吉書狀〉，頁572。

<sup>45</sup> 《喜連川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3，頁29右。

<sup>46</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139。

<sup>47</sup> 《相良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5，699號，〈石田正澄書狀〉，頁117。

<sup>48</sup> 《南行雜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1，頁55右。

<sup>49</sup> 《松浦文書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謄寫本)2，〈松浦鎮信宛朱印狀〉，頁30上下。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文書篇，第8號，頁8。

<sup>50</sup> 《小山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真帳)2，12條〈藤堂佐渡守注文〉。

<sup>51</sup> 《伊達家文書》2，624號，〈仙石曾繁書狀〉，頁1118。

<sup>52</sup> 《毛利家文書》3，866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30。

<sup>53</sup> 《毛利家文書》3，879號，〈豐臣秀吉捷書〉，頁140。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323。

<sup>54</sup> 《吉川家譜》(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頁36左-38右。

<sup>55</sup> 《吉川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9，893號，〈聖護院道澄書狀〉，頁44。

<sup>56</sup> 《吉川家文書》2，742號，〈證明出陣捷遵奉起請文案〉，頁713-714。日下編，《豐公遺文》，頁330-331。

正十七年給琉球國王的文書，有「可振威風於大明之念望，豈空乎。」<sup>57</sup>天正十八年十一月給朝鮮國王的文書，有「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sup>58</sup>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給印度副王的回信，有「雖然一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sup>59</sup>

秀吉對明的態度是征服，此由攻陷漢城後，五月十八日他從名護屋大本營給關白秀次(1568-1595)的書狀，即二十五條「覺」，可以看到他對明懷抱的野心，及他預定征服明後的擴張計畫。如第一條是翌年(1593)正月或二月秀次從聚樂第出發渡海至朝鮮，更且進入中國。第二條和第十九條是由秀次就任「大唐關白職」。第二十三條是至秀次渡海止，征服明帝國也結束。第十八條是第三年(1594)將後陽成天皇移至大唐都(北京)的計畫，換言之即由日本天皇取代中國皇帝。另給予天皇、官家國都附近十國，大唐關白秀次百國。日本天皇地位則讓給皇太子周仁親王(若宮)，或皇弟智仁親王(八條殿)。日本關白由秀次之弟秀長(1540-1591)養子豐臣秀保(1579-1595 大和中納言)或宇喜多秀家(1573-1655 備前宰相)就任。<sup>60</sup>至於秀吉自身如何安排，二十五條覺中看不到。但同一天，秀吉的親信山中長俊(橋內)給豐臣家侍女十八條的書信中，第一、第七條是秀吉決意渡海，並在這年至北京。第十三、十四條，則明確提到進入北京後，為征服天竺，他將移居日明貿易港寧波。第十五條是將毛利輝元(1553-1625)、長曾我部元親(1539-1599)、島津義弘、大友義統(1558-1610)諸氏移至支那，並給予厚封。其他將士則給予十倍或二十倍的領地，<sup>61</sup>完全是以封土、領地鼓勵諸將攻取明國。

此外，如文祿元年六月三日給出兵朝鮮諸大名的證明檄文，有「如汝等者，將數十萬之軍卒，可誅伐如處女大明國，可如山壓卵者也。」<sup>62</sup>同日

<sup>57</sup> 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編，《武家事紀》，卷30，「古案・豐臣家上」，頁481下。

<sup>58</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6。

<sup>59</sup>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頁423-425。

<sup>60</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復刊)，別編第一，頁35-38。

<sup>61</sup> 《組屋文書》，收入小浜市史編纂委員會編，《小浜市史》(福井縣小浜市：小浜市役所，1979)，諸家文書編一，頁137下-140上。

<sup>62</sup> 《毛利家文書》3，90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63。

給毛利輝元的朱印狀，有「日本弓箭之國」、「大明長袖國」<sup>63</sup>之語。秀吉認為誅伐大明，易如山壓卵。武勇的日本，必可征服文弱的大明。

文祿二年五月中旬，明使謝用梓(參將)、徐一貫(遊擊)至名護屋協議停戰。六月二十八日秀吉提出七條「大明日本和談條件」，其中第一、二、三條與明直接有關。第一條為迎大明皇帝之女為日本后妃。第二條是恢復勘合，使官船、商船互相往來。第三條是日、明兩國大臣交換誓約，<sup>64</sup>誓言友好。第一條的和親，是仿中國與外夷友好時的通婚政策。第二條恢復勘合貿易，此為朝貢貿易，日本國王須受冊封。但秀吉對此體制並不瞭解，他只想恢復貿易。第三條交換誓約，則是東亞國家和談成功時的慣例。秀吉作此要求，較之前一年遷都北京、出駐寧波，統制大明的抱負，已明顯後退，但仍將明朝視為對等國。當明決定派遣冊封使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時，秀吉也因此大怒。在提出此七條件的同日，秀吉給石田三成(1560-1600)、增田長盛、大谷吉繼(1559-1600)、小西行長四人「大明 使可告報之條目」中，有：

大日本者神國也，神即天帝，天帝即神也。……予懷胎之初，慈母夢日輪入胎中，覺後驚愕，而召相士筮之曰：天無二日，德輝彌綸，四海之嘉瑞也。故及壯年，夙夜憂世憂國，……纔歷十有一年，族滅凶徒姦黨，而攻城無不拔，國邑無不有乖者自消亡矣。已而國富家娛，民得其所。心之所欲無不遂，非予力天之所授也。一日本之賊船，年來入大明國，橫行于所所。雖成寇，予曾依有日光照臨天下之先兆，欲匡正入極，既而遠島邊陲，海路平穩，通貫無障礙，制禁之。大明亦非所希乎，何故不伸謝詞。蓋吾朝小國也，輕之侮之乎，以故將兵欲征大明。然朝鮮見機，差遣三使結隣盟乞憐。<sup>65</sup>

秀吉要石田三成等四人向明 使說明，日本是神國，他是日輪之子。十一年間，他統一日本，此為天授。他禁制倭寇，但大明並未有謝詞，這是輕

<sup>63</sup> 《毛利家文書》3，904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67。日下寬，《豐公遺文》，頁375-376。

<sup>64</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6-37。三上參次，〈文祿役に於ける講和條件〉，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頁157-158。

<sup>65</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7-38。

蔑日本是小國，因此派兵征伐大明。秀吉將征討大明的原因，歸咎於大明輕侮日本。

秀吉對東亞諸國的態度是征服，但天正十七年以前對異國、異域尚未有強烈要求其服屬的文書。天正十七年以後，給琉球、印度、菲律賓、高山國的文書，甚至對明使的說明，基本上有其已統一日本、欲征大明、出生時的奇瑞、日本是神國、欲弘政化於異域、修好結誼等這些文字。對琉球很明顯的將其視為屬國，對菲律賓、高山國則表示若不朝貢將出兵征討。征服大明是他的目的，周邊東亞諸國當然是歸屬他支配。他想擴張領土，眼界不只是東亞，而遠睥睨西南洋。他以出生時的奇瑞，說明其統一日本是天命，而此天命論也適用於異國和異域。他更且主張日本是神國，如天正十五年五月三日島津義久投降，九州平定。六月十九日秀吉便發布驅逐傳教士的命令，此令第一條即強調日本是神國。<sup>66</sup>在對南蠻國家的外交文書中強調日本是神國，目的是為排除基督教，此在慶長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給菲律賓的文書也可以看到。<sup>67</sup>對明強調日本是神國，論據則是「神即天帝，天帝即神。」所謂「日本是神國」，是依對象不同，目的和論據也不同。至於施政化於異域，以異邦作四海一家，顯名於日、朝、明三國，是他對外最終的目的。

### 三、侵略朝鮮

#### (一)發動戰爭的原因

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說法不一，大致可歸納如下：1.三歲愛子鶴松病死。2.統一國內後欲消耗大名的軍力。3.欲恢復與明之勘合貿易被

<sup>66</sup> 禁教令有五條。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頁378-379。

<sup>67</sup>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110。秀吉將基督教視為邪法，此邪法將使日本不穩定，神國的日本是不容邪法存在的。追究其本心，實藉此以強化其權力。鈴木良一，《豐臣秀吉》（東京：岩波書店，1954），頁85；143-144。海老沢有道，《日本キリシタン史》（東京：塙書房，1972），頁265-288。

拒。4.征服欲和功名心。<sup>68</sup>這些因素對秀吉發動對外戰爭，或許都有影響，但應該只是真相的一部份。鶴松在天正十九年八月五日死亡，征明的決定在大坂發布是八月二十三日，因此有此說。如林羅山(1583-1657)言：

棄君早逝，秀吉憂悲之情焦思，慘怛之色乾肝，群臣亦皆斷髮以示哀情。秀吉為忘憂，故遊清水寺，滯留三日。然悲哀彌熾，涕泗滂沱，於是始有欲入朝鮮之志，蓋自慰也。<sup>69</sup>

當時左大臣近衛信尹(1565-1614)的《三藐院記》和堀正意(?-1642)的《朝鮮征伐記》，都將鶴松的早死與秀吉決定征明結合在一起。<sup>70</sup>秀吉當時五十四歲，鶴松為側室淀君所生。在此高齡喪子，其悲傷可知。但在軍事上縱橫南北統一日本的秀吉，其對外戰爭的動力，應當不只來自此悲傷的泉源。荷蘭人 Montanus(1625?-1683)於十七世紀中葉發表《日本誌》，其中有秀吉「出兵朝鮮的目的，是為了不使諸大名在太閤領內紛亂。如果他們在朝鮮打勝仗，可以將征服的領土分給他們。他自身則可在本國成為絕對的支配者。」<sup>71</sup>之記載。《兩朝平攘錄》載：

秀吉恃己富強，侵略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奉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其都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己之子方在乳抱。故疑忌者，盡發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孫七郎子興哥，皆往朝鮮是也。<sup>72</sup>

《日本外史》載：

<sup>68</sup> 德富豬一郎，《朝鮮役》，上卷，收入《近世日本國民史》(東京：民友社，1921)，頁113-141。

<sup>69</sup>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明曆四年(1658)刊本)中，頁31上。鶴松死的第二天，遺體移至東福寺。秀吉至東福寺，悲歎並在矢庭割髻供奉，隨行諸將亦割髻，以致髮髻堆積如山。七日至清水寺停留三天，之後到有馬溫泉，十八日回大坂。英俊等編，《多聞院日記》，收入竹內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東京：臨川書店，1994)，「八月六日」、「八月八日」條，頁307下-308上。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經略》，頁83-84。

<sup>70</sup> 近衛信尹著、近衛通隆等校訂，《三藐院記》(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5)，「豐臣秀次任內大臣次第」，頁140-142。堀正意，《朝鮮征伐記》，收入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通俗日本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1913)第20冊，卷1，頁4上。

<sup>71</sup> モンタヌス著、和田萬吉譯，《日本誌》(東京：丙午出版社，1925)，頁194。

<sup>72</sup> 諸葛元聲輯、商濬校，《兩朝平攘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下，「日本上」，頁34。

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sup>73</sup>

即荷蘭、明朝史料及幕末學者，均記載有秀吉想將大名的軍事力消耗在征朝鮮的戰爭中。但從二次征朝鮮動員的兵力大部分是親近秀吉的大名，如小西行長(1555?-1600)、加藤清正(1562-1611)、石田三成等，而其他大名的軍隊很少被動員此一事實，可以推測並非完全如此。尤其對秀吉威脅最大、實力強的德川家康，僅出兵五千，此亦可佐證。<sup>74</sup>至於恢復與明勘合貿易的大致說法是，秀吉繼承織田信長(1534-1582)的遺志，希望經由朝鮮斡旋恢復與明貿易，但朝鮮不答應，明亦無此意，因此發動戰爭。戰國時代的日本，群雄競爭促使各地開發，產業發達。秀吉則統一貨幣，實行檢地，整頓稅制，增強國勢。又，當時日明間海寇貿易亦盛行。<sup>75</sup>在此環境下，秀吉欲與明以正式管道進行貿易，亦可理解。但以當時東亞海上活動的頻繁，及他給予渡航海外者朱印狀，諭令琉球、呂宋、高山國朝貢，可以知道他經略海外的企圖。因此將恢復勘合貿易視為其對外戰爭的動機，似乎過於單純化。至於所謂繼承織田信長遺志的說法，可能是將天正七年(1579)右武衛殿(或稱右武衛將軍)派遣使者天荊至朝鮮，誤認為是信長所派遣。其依據大約是天正九年(1581)朝鮮宣祖給予日本國王的回信。<sup>76</sup>事實上右武衛殿是源義明，其次子義堯為九州探題，右武衛殿是原九州探題波川道鎮(1372-1446)的子孫，<sup>77</sup>誰冒稱不清楚，但右武衛殿並非信長。其次天正九年朝鮮宣祖給予「日本國王」回信，是因天正八年(1580)八月正使景輟玄蘇(1537-1611)、副使柳川調信至朝鮮，此日本國王則為足利義昭(1537-1597)。當時義昭正流寓備後鞆(廣島縣福山市鞆町)，他與對馬宗氏有聯繫，宗氏利用他向朝鮮要求恢復舊有權益，如增加受圖書人、重開齋浦、廢使船大小之別等，與信

<sup>73</sup> 賴山陽，《邦文日本外史》，17卷，「豐臣氏下」，頁862。

<sup>74</sup> 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頁222。

<sup>75</sup>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中冊，頁79。

<sup>76</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0-32。

<sup>77</sup> 九州探題亦稱鎮西探題、九州管領，鎌倉、室町兩幕府為統制九州而設的官職。應仁之亂(1467-1477)後有名無實，豐臣秀吉統一全國後名實俱亡。

長並無任何關係。<sup>78</sup>關於征服欲和功名心的說法，如僧規伯玄方(1588-1661)為對馬島主宗義成(1604-1657)撰寫之《太閤秀吉朝鮮征討起本》中記載，秀吉至東福寺，看到開山聖一國師円爾(1202-1280)的像，知道円爾在日本和中國均有好聲名，勝蹟流傳後代，因此心意大動，而起外征之心。<sup>79</sup>又《續本朝通鑑》載：

(天正六年，1578)二月甲辰，秀吉帥師向播州。臨發，信長謂秀吉曰：我以播授汝，運策全身，減毛利，則中國悉汝其管之，勉哉勿懈。秀吉對曰：假君餘威西征，則何處不平。如中國，則如破竹耳。臣速平中國獻之，分畀麾下羣士，而賜九州管領職，統治筑紫，而可圖朝鮮，窺中華，是臣之素志也。信長笑曰：汝可謂大膽也。<sup>80</sup>

近代學者考據此段話認為是謬傳，但也反映了秀吉的征服欲。<sup>81</sup>天正十八年十一月秀吉給朝鮮國王的書信，有「予願無他，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sup>82</sup>Crasset(1618-1692)的《日本教會史》在敘述小田原之戰後，接著又言：「彼(秀吉)統一日本全國，尊大傲慢之心漸長，以至計畫征服支那，傳其名聲於不朽；且以博識或偉勳，赫其聲名，思與人人齊配神位。」<sup>83</sup>對外戰爭是為了在三國顯佳名，是為了死後與日本豪傑的神位並列，受後世尊崇。<sup>84</sup>

近代學者分析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動機，較具代表性的有，1.恢復勘合貿易說。2.為功名欲征服海外說。3.擴張領土說。4.秀吉的專制性格說。<sup>85</sup>除

<sup>78</sup>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頁80-81。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上，頁749-770。田中義成認為，右武衛殿的遣使，是織田信長假義昭之名派遣的使節。田中義成，〈豐太閤の外征に於ける原因に就て〉，《史學雜誌》，第16卷第8號(東京，1905.08)。

<sup>79</sup>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頁75。

<sup>80</sup> 林恕，《續本朝通鑑》(東京：國書刊行會，1919)，卷206，頁5226。

<sup>81</sup> 田中義成以龜井茲矩和鍋島直茂為例，認為《續本朝通鑑》所載不一定是謬傳。田中義成，〈豐太閤の外征に於ける原因に就て〉，《史學雜誌》，第16卷第8號，頁720-725。

<sup>82</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6。

<sup>83</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38。

<sup>84</sup> 秀吉發動戰爭的動機，另參見阿部愿，〈豐臣氏征韓の趣義を究めて其動機に及ぶ〉，《史學雜誌》，第17卷第1號(東京，1906.01)，頁1-17。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史學》，第4卷第3號(東京，1925.08)，頁72-75。

<sup>85</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17-19。

不認為鶴松死對秀吉發動對外戰爭有影響外，看法與江戶時代的學者及外國傳教士，大致相同。

秀吉侵略朝鮮的原因雖有各種說法，但其日本是神國的思維，亦不可忽視。秀吉明確有神國思想始於天正十二年(1584)五月協助比叡山延曆寺根本中堂戒壇院再興，他將神社佛閣作為「國家的事務」予以護持。又，東大寺被松永久秀(1510-1577)燒毀後，秀吉在京都建方廣寺，此有如源賴朝(1147-1199)再建東大寺，他是以鎮護國家的立場向天下昭示其政權的正當性。秀吉以聖護院道澄擔任方廣寺管領、住持，他藉道澄導入天台系神國意識，以掌握大寺社及朝廷、公家的勢力。比叡山延曆寺是天台宗的總本山，天台系鎮護國家的思想，是由領主、地主的守護神，擴大為「日本國地主」的神，將「日本是神國」予以理論化。<sup>86</sup>秀吉會見朝鮮使節時，是以道澄陪侍在側。

又，擔任起草外交文書的五山禪僧西笑承兌(1548-1608)，熟讀漢籍，瞭解中國歷史上一些人物誕生時的奇瑞。王朝開創者若因奇瑞而誕生，有此神異加持可強化其統治天下的正當性。他運用此一東亞地區的傳承，<sup>87</sup>將秀吉神化。如給高山國、呂宋、大明的文書中，均提及秀吉是「日輪之子」，給朝鮮的文書亦有此文字。西笑承兌是秀吉的政治顧問，此一作法可以說也是直接反映秀吉的神國思想。日本是神國，其出生時又有奇瑞，出兵朝鮮則是天授。

秀吉發動這場侵略戰爭，雖有很多大名支持，但反對者也有。加藤清正、鍋島直茂(1538-1618)、龜井茲矩等均支持秀吉，並希望在外國取得領地。如加藤清正受命進兵朝鮮，即很高興的想「在大唐(明)拜領二十國」。鍋島直茂則向秀吉獻出肥前國領地，並要求出兵後另在大陸取得部分土地。龜井茲矩於天正十年已向秀吉提出希望取得琉球，秀吉也給予「琉球守」的

<sup>86</sup>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126-128。

<sup>87</sup> 三品彰英將朝鮮、蒙古、東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始祖神話分為(1)卵生型神話(2)箱舟漂流型神話(3)感精型神話(4)獸祖型神話。由雷電、星辰、日光感應而生為感精型神話，秀吉即屬此型。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122、125。

稱號。<sup>88</sup>這時期很多大名熱望擴大領地，秀吉也適時予以利用。反對者有德川家康、毛利輝元、有馬晴信(1567-1612)、前野長康(1528-1595)、細川藤孝(1533-1610)等。據傳教士 Luis Frois(1532-1597)記載，秀吉對有馬晴信言：「在其地(大唐)給汝三國」，有馬晴信雖表示感謝，但內心仍希望擁有自己出生的土地。<sup>89</sup>有馬晴信是信奉基督教的大名，Frois 為這些大名道出內心真正的想法。前野長康批判秀吉出兵，他與細川藤孝均感嘆、憂心秀吉侵攻朝鮮。細川藤孝甚至捨命上諫，認為出兵朝鮮是一場困難的戰爭。此次出兵並非「一將功成萬骨哭(枯)」，而是「一將不成，徒曝屍邊土之愚事。」<sup>90</sup>秀吉的異父弟秀長也反對秀吉出兵，他極力主張應以和議與外國交流。若大名中有欲求領國者，他願意分出自己的領國給予此大名。<sup>91</sup>時秀長已病重，他是託千利休(1522-1591)向秀吉提出中止出兵朝鮮的諫言。<sup>92</sup>反對的大名和親信，對秀吉出兵朝鮮心存危懼和不安。據 Frois 描述，當時人人厭惡此戰爭，認為這只是去送死，日本國內充滿不安和慨嘆。<sup>93</sup>但內心反對卻仍出征的武士和大名仍不少。秀吉出兵朝鮮，欲消耗大名軍力或許也是原因，但多數大名想藉此戰爭在國內外取得領地，此或可說亦是其發動戰爭的動機之一。

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鮮的理由，由慶長元年他發布如下檄文大致可知。

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卒不達大明，無禮多多，其罪一。既依沈督指揮寬宥二王子竝夫妻以下，不先致禮謝，隨明使過海之役，歷數日而王子不親來，唯馳黃朴之賤价，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覆，經歷數年，其罪三。右件件之大罪，雖天地豈能

<sup>88</sup> 貫井正之，《秀吉が勝てなかった朝鮮武將》(東京：同時代社，1996)，頁17-18。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東京：文獻出版，1993)上，頁57-59。

<sup>89</sup> フロイス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2，「豐臣秀吉篇2」，頁163。フロイス是葡萄牙傳教士，1563年7月6日至日本，1597年7月8日在長崎過世。

<sup>90</sup> 吉田蒼生雄譯注，《武功夜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卷17，頁181-186。

<sup>91</sup>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上，頁54。

<sup>92</sup>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上，頁51-53。秀長於1591年正月22日病逝。

<sup>93</sup> フロイス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2，頁162、163。

可蔽之呼。明春舉百萬大兵屠殲朝鮮禽王李昭，懸首於日本獄門。  
且國城亦一炬成焦土者，猶指諸掌。爾莫悔。<sup>94</sup>

即朝鮮無禮、二王子不赴日、和談不成，因此出兵朝鮮。此次出兵，似乎只是面子問題。較之第一次所懷野心，大為退縮。

## (二)對朝鮮的態度

秀吉對朝鮮的態度是希望朝鮮臣服，並作為其征明的嚮導。天正十四年四月十日他給毛利輝元十四條「覺」，其中一條是「高麗御渡海事」。<sup>95</sup>天正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給夫人北政所的書信，則有使朝鮮國王至京都朝覲、征服明國的語句。<sup>96</sup>《懲毖錄》載：「(秀吉)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為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來求通信。」<sup>97</sup>《行年日記》載：「是年(天正十五年)冬，日本國使橘康廣出來言新國王平秀吉廢前王，發兵平定諸島，欲與我國修好，請遣通信使，為此而來之。」<sup>98</sup>天正十五年康廣赴漢城時，態度傲慢。《懲毖錄》載：

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傀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恠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憂，而獨為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

<sup>94</sup> 大關定祐，《朝鮮征伐記》，第10，頁38。

<sup>95</sup> 《毛利家文書》3，949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28。

<sup>96</sup> 《妙滿寺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高臺院杉原氏宛消息〉，頁2右-3右。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豐太閤真蹟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上，第18號。〈薩州凱陣の途次夫人淺野氏に贈る書狀〉，收入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139。

<sup>97</sup> 柳成龍，《懲毖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卷1，頁272。

<sup>98</sup> 李廷範，〈行年日記〉，《四留齋集》，卷8，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第51冊，頁327上。

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sup>99</sup>

康廣所攜之國書，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朝鮮在其回國時，則以「水路迷昧」，拒絕派遣使節至日本。<sup>100</sup>天正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秀吉給宗義智(1568-1615)書信，要求其督促朝鮮國王至京都。如果不來，將派小西行長(攝津守)和加藤清正(主計頭)率九州軍隊渡海至朝鮮。至今夏為止，國王必須至京都。<sup>101</sup>六月，宗義智以博多聖福寺僧景轍玄蘇為正使，自己為副使，加上柳川調信(都船主)，博多商人島井宗室(1539-1615)等二十五人，渡海至漢城。<sup>102</sup>朝鮮表示明為其宗主國，要求國王赴京都，實即臣屬之意，此難為朝鮮所接受，因此宗義智改請朝鮮派遣使節。十一月十八日，朝鮮國王任命黃允吉為正使，金誠一(1538-1593)為副使，許箴為書狀官。一行於天正十八年三月五日從漢城出發，七月二十一日到達京都。秀吉因平關東、奧羽，九月一日凱歸京都，十一月七日始在聚樂第接見朝鮮使節。<sup>103</sup>朝鮮使節上呈之國書如下：

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海，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後，隣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齎。不宣。<sup>104</sup>

朝鮮派遣使節至日本，是為「講信修睦，以敦隣好」，但秀吉則視其為貢使。秀吉回覆的國書，稱朝鮮國王為「閣下」，國書內容如下：

抑本朝雖為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

<sup>99</sup> 柳成龍，《懲寇錄》，卷1，頁272-273。

<sup>100</sup> 柳成龍，《懲寇錄》，卷1，頁272、273。

<sup>101</sup>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篇，第1號，頁1。

<sup>102</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卷23，「二十二年六月乙巳」條，頁4。

<sup>103</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23，「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條，頁20；卷24，「二十三年三月丁未」條，頁3；卷25，「二十四年一月庚戌」條，頁3。

<sup>104</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4-35。

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入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觀，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予願無他，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蓄。<sup>105</sup>

國書中強調秀吉出生時的奇瑞，依此奇瑞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其欲征大明四百餘州，要朝鮮「先驅入朝」，他的願望是顯佳名於三國。國書稱朝鮮國王為「閣下」，對朝鮮使節至日稱「入朝」，贈物稱「方物」，完全將朝鮮看作是屬國。秀吉對朝鮮這次派遣使節至日本，認為是朝鮮歸服日本，此由慶長二年(1597)加藤清正與松雲惟政(1544-1610)的對話可以推知。

清正問：……粵八年之前庚寅之歲(1590)，朝鮮國王送使者於日本，奏太閤殿下曰：朝鮮歸服于日本矣。繇是太閤殿下大喜曰：朝鮮已歸服矣，更可征伐大明國也。……先問八年之前庚寅歲，自朝鮮送使者於日本，是非歸服而何乎？

松雲答：庚寅歲送使於日本者，只是交隣通信相好而已矣，非歸服也。

清正問：其時，或人奏太閤殿下云：朝鮮歸服于日本矣，此是偽乎？

松雲答：此時對馬島守與行長所奏偽也，欺罔日本及我朝鮮，非實語也。<sup>106</sup>

朝鮮遣使的目的是「交隣通信相好」，由於負責交涉的對馬島主宗義智和小西行長隱匿實情，使秀吉相信朝鮮使節至日本是歸服之意。秀吉接待朝鮮使節時，「肆意自得，傍若無人。」《懲毖錄》載：

<sup>105</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5-36。

<sup>106</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74。

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傍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sup>107</sup>

秀吉對朝鮮的態度，不僅要其臣服，且更要征服。此另可由其賜給出兵諸將領朝鮮地圖略知一、二。天正十九年秀吉命宗義智假扮商人赴朝鮮觀察地形，六月宗義智獻朝鮮八道圖給秀吉。文祿元年征伐朝鮮時，秀吉仿畫此圖賜給諸將。藤堂家收藏的朝鮮地圖，大約是當時秀吉賜予的。此地圖用五色區別八道，如慶尚道是白色，全羅道是赤色，忠清、京畿兩道是青色，平安、江原兩道是黃色，咸鏡道是黑色，黃海道無顏色。諸將領多以顏色稱各道，所謂赤國、白國等，為當時的慣用語。慶尚、全羅兩道很詳細，此大約與對馬和釜山相近，測量方便有關。戰爭需要地圖，由秀吉命宗義智觀察朝鮮地形，繪製地圖，可窺知他早有用兵朝鮮的計畫。<sup>108</sup>又，其所持扇面上繪有日本、朝鮮、中國三國的地圖，其中朝鮮的京城，中國的北京、南京特別用紅色標示，<sup>109</sup>此似亦可觀察他征服朝鮮的心志。

#### 四、在朝鮮的占領政策

秀吉出兵朝鮮，目的在占領。日軍攻陷漢城後，即協議八道由毛利輝元(慶尚道)、小早川隆景(全羅道)、福島正則等(1561-1624 忠清道)、森吉成等(江原道)、宇喜多秀家等(京畿道)黑田長政等(1568-1622 黃海道)、加藤清正等(咸鏡道)、小西行長等(平安道)分治，採取由諸將直接支配的措施。治理上與日本國內一樣，使農民定居，收稅納貢。<sup>110</sup>調查各地的生產以定稅額，由各

<sup>107</sup> 柳成龍，《懲寇錄》，卷1，頁277-278。

<sup>108</sup> 藤田明，〈豐太閤所持と傳へらるる扇面及び朝鮮役に用られたる地圖〉，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頁144-147。

<sup>109</sup> 藤田明，〈豐太閤所持と傳へらるる扇面及び朝鮮役に用られたる地圖〉，頁147-148。

<sup>110</sup> 1592年6月3日秀吉給黑田長政的朱印狀。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篇，43號之1，頁51。

道支配者命朝鮮官吏提出。<sup>111</sup>如鍋島直茂在六月下旬進兵咸鏡道後，即開始進行調查。八月初，其所領高原郡、定平府、咸興府、洪原縣、德原郡等，即提出「租稅牒」。<sup>112</sup>此租稅牒是由鄉吏調查農作物、特產物、人口等。最後寫誓約文、鄉吏的名字，鄉吏需押印。<sup>113</sup>又如九鬼四郎兵衛和粟生一郎右衛門尉在端川，管理銀山，由鄉吏收稅，召禮伯(六伯)收年貢。<sup>114</sup>是琢《朝鮮日記》載：「國中(咸鏡道)庶民，初隨日本號令，納產貢，勤租稅。」<sup>115</sup>八道徵收租稅與日本相同，採「四公六民」制。據文祿元年七月十三日發布的「高麗八州之石納覺之事」，各道分配要徵收的總額為11,916,166石，其中慶尚道2,887,790石，全羅道2,269,379石，忠清道987,514石，江原道402,289石，京畿道775,113石，黃海道728,867石，咸鏡道2,071,028石，平安道1,794,186石。<sup>116</sup>在占領地徵收米糧掌握資源可確保軍隊久駐，達到實質占領的目的。

同化是秀吉占領朝鮮的方策之一，此由文祿元年六月八日安國寺惠瓊給其住寺諸僧的書信，大致可以了解。如教朝鮮人「いろは」，仿日本習俗大人小孩均剃髮，小孩讀書作詩，懂文字的朝鮮人每五日或十日給予訓練，然後派遣至各地。<sup>117</sup>即意圖在朝鮮普及日語，同化朝鮮風俗，培養可以為日軍工作的人員。《豐臣秀吉譜》載：秀吉在三月往名護屋大本營時，群臣向他建議，應選有文才者隨行，以備與明、朝鮮書信往來時之需。秀吉答曰：讓朝鮮人使用日本的いろは即可。但經過考慮之後，認為還是有必要。因此派相國寺的西笑承兌、南禪寺的玄圃靈山、東福寺的惟杏永哲(?-1603)等三位禪僧隨行。<sup>118</sup>此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常為後世所引用。

<sup>111</sup> 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編，《武家事紀》，卷31，「古案・豐臣家下」，〈朝鮮國石積〉，頁500。

<sup>112</sup> 芝葛盛，〈文祿役に於ける佔領地收税の一斑〉，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頁189。

<sup>113</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106。

<sup>114</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113、116。

<sup>115</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106。

<sup>116</sup> 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頁243。中野嘉太郎，《加藤清正傳》(熊本：青潮社，1979)，頁206-207。佔領地有限，此僅為一紙命令。

<sup>117</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381。

<sup>118</sup> 原先是西笑承兌、惟杏永哲、瑞保三人。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大洋

日語在朝鮮普及的程度，據《宣祖實錄》載：「傳曰，都中小民久陷賊中，不無染習倭語之理，各別掛榜痛禁。如或有倭語者，各里中嚴加科正，毋使蠻夷讐賊之音，或雜於閭里之間。」<sup>119</sup>、「令禁民間倭語」。<sup>120</sup>漢城陷落後，朝鮮百姓在日軍統治下已有使用日語者。宣祖還都後，翌年十月特別下令嚴加禁止。日軍占領漢城至撤退(1592年5月-1593年4月)只有十一个多月，但日語在漢城已相當普及。《豐臣秀吉譜》中，所謂秀吉要讓朝鮮人學習日語的記載，實際上已在占領地實現。

足利政權時代，禪僧已擔任外交使節或起草外交文書的工作，秀吉亦任用禪僧為其與明、朝鮮溝通。在各出征將領的軍中，亦多有僧侶同行，如小西行長軍中有妙心寺僧侶天荆，宗義智軍中有博多聖福寺僧侶景轍玄蘇及竹溪宗逸、三玄，鍋島直茂軍中有泰長院僧侶是琢，小早川隆景軍中有安藝國安國寺僧侶惠瓊，吉川廣家軍中有僧侶宿盧俊岳。他們在占領地起草安民榜文和外交文書，如文祿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天荆在慶尚道仁同以宗義智名義，起草榜文：「散民速還于本宅，而男耕田稼苗，女採桑畜蚕。士農工商，各修家業。若吾軍士有犯法以妨汝之業者，必罰矣。」<sup>121</sup>五月二十一日應清正家臣齋藤伊豆守利光之請，對占領地的文武地方官和農民起草榜文。對地方官的榜文：「呈示境內之文武官僚，奉吾殿下(秀吉)之命，安撫此境內。僕(清正)雖不敏，要布善政於境內，各還本宅，以精我芸，則必應其器以授職矣。先服者賞之，不服者罰之，請計之。」對農民的榜文：「示諭境內之黎民及鰥寡孤獨，僕奉吾殿下之命，撫當境，要除苛政而布善政，救民於塗炭。速還舊居，以各修家業，勿疑勿疑。」<sup>122</sup>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為平調信製作勸和文書。<sup>123</sup>文祿元年六月，是琢為加藤清正在咸鏡

社，1935)，卷38，「天正十六年八月六日」條，頁28上下。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中，頁35。

<sup>119</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43，「二十六年十月壬辛」條，頁649下。

<sup>120</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79-80。

<sup>121</sup> 天荆，《西征日記》，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3，卷1，頁677下。

<sup>122</sup> 天荆，《西征日記》，頁681上。

<sup>123</sup> 文書中有：「伏願還國王之駕於洛陽，講和於大明，則臣等所欲也。」、「夫滅朝鮮者朝鮮，非日本。亮察亮察。臣竊慮之，還國王之駕於洛陽，以講和於大明，則

道作農民歸家勵農耕的榜文。同年六月十五日在醴泉發的榜文，為宿盧俊岳所起草。<sup>124</sup>同年六月毛利輝元在慶尚道亦由從軍僧起草如下榜文：「永行日本禮樂於此邦，而要移風換俗也。上百官，下至萬民，得此心則速出山中受降。而在其官者事官役，業其農者勤耕農。……今出山而受降者活之，又可與恩賞也。不改舊惡，於不來服之輩者，尋求山間可殺之也。可憐生，若復各居縣邑之日，我日本之人或奪官民之妻子資財，或致濫妨狼籍者，即日縛其人可加誅罰也。」<sup>125</sup>

秀吉以從軍禪僧勸化當地百姓，安定當地社會秩序。因此佔領區的朝鮮人，也漸從日本習俗，並與日本人交易。據權慄(1537-1599)的狀啟：

倭賊與我人非其同類，前則我民之視此賊如狼虎蛇蝎，聞之慄然，況敢之同處乎。是以倭賊當初入境之時，雖分遣醜類雄據郡邑，勢力甚盛。而我國之民除被脅勒留者外，其餘皆捉挈老幼，分散山谷，未有甘心投入者。故賊勢雖熾，而民心則不至陷溺，此乃國家收復之根本也。今賊久居邊境，歲月既多，而殺戮稍戢。又佯為煦儒之狀，不相侵暴，資以飲食，則愚民之失其常性，困於飢餓者，已紛然相率而歸之，不可禁抑。為之耕田、納租以供其役而不恥。日往月來，幾與之化而相忘焉。傳聞東萊、釜山、金海等處，耕黎滿貯，三分之二皆為我國之民，而往往有剃髮染齒以從其俗者。又有遠處買賣之人，各持其物，往來互市於賊陣，略無防範界限，事之寒心，無過於此。<sup>126</sup>

在東萊、釜山、金海等地，朝鮮人多有剃髮染齒，從日本習俗者。據《再造藩邦志》載：

士民奔避者，未久密逕集坊里，市肆依舊填滿，與賊相雜，販賣交易。賊多出精勇緊守四門，而我民之帶賊貼者不禁出入。於是服役受貼，無敢違逆。<sup>127</sup>

貴國之策莫良焉。」天荆，《西征日記》，頁679上下。

<sup>124</sup>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152、154-155。

<sup>125</sup>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本篇，附記第5，〈民政及賑恤〉，頁158。

<sup>126</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61，「二十八年三月甲戌」條，頁2。

<sup>127</sup> 申昞用，《再造藩邦志》，卷1，頁57上。

知漢城士民遵照榜文還居，且與日軍相雜交易，服役受貼。又，據〈辰巳日錄〉載：

留蘆洞，流聞倭賊留住空城，糧餉亦窘，將欲窮追大駕所在，仍指燕京(北京)以為荐食之計，且欲以其俗易吾俗云。<sup>128</sup>

即日軍同化朝鮮風俗的政策，在聞慶地區也有傳聞。

日軍無論軍事進展是否順利，割地且永久佔領是其政策。文祿元年十月清正曾對咸鏡道北兵使韓克誠(?-1593)和南兵使李瑛言：「貴國郡縣幾為日本所有，若大王更修隣盟，則其中一、二道可還。」<sup>129</sup>朝鮮王子和大臣的書信中也有：「日本別無他意，……王言旨以二、三道為界，平分境土，罷兵講兩國之和也。」<sup>130</sup>顯見清正對割地的關心，且反映日本對處置征服地的自信。文祿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秀吉向明提出和談七條件，其中第四條是割朝鮮四道，即全羅、慶尚、忠清三道及京畿南半部給日本，咸鏡、平安、黃海、江原四道及國都漢城還給朝鮮。第五條是以朝鮮王子和一位大臣為人質。第七條是朝鮮大臣必須誓言累世不背日本。<sup>131</sup>秀吉在此軍事進展不順利之際，交涉的重心仍是要朝鮮割地。但他對朝鮮的野心已大為縮小，只想保有朝鮮四道來結束戰爭。

慶長二年戰爭再起時，慶尚道右兵使金應瑞向倭通事要時羅打聽秀吉出兵的原因時，小西行長曰：「關白之意非戰鬥，欲奪朝鮮之地方也。朝鮮不肯相和，故欲示兵威而取和也。今此之舉，只犯全羅而還兵。」<sup>132</sup>秀吉再出兵，目的還是要奪取朝鮮土地。

此外，由秀吉指示建造行營和「繫城」，及在半島南部營建倭城，也可以說明他永久佔領朝鮮的規劃。文祿元年五月十六日秀吉給在朝鮮諸將領的朱印狀中，明確指示自釜山至京城間由各軍分擔建造十三處行營。<sup>133</sup>規

<sup>128</sup> 趙靖，〈辰巳日錄〉，「五月十九日」條，頁11下。

<sup>129</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31，「二十五年十月乙巳」條，頁16夾註。

<sup>130</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31，「二十五年十月乙巳」條，頁17夾註。

<sup>131</sup>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頁36-37。《毛利家文書》3，929號，〈豐臣秀吉和平條件書案〉，頁197-198。

<sup>132</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卷88，「三十年五月戊申」條，頁84下。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頁278。

<sup>133</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360-361。

劃的行營，五月二十六日毛利輝元的書狀記載有十一處，但六月八日惠瓊的書狀則記載十九處。<sup>134</sup>《毛利家文書》記載各處行營名稱有如下二十二處，即釜山浦、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八莒、仁同、善山、尚州、咸昌、聞慶、鳥嶺、延豐、槐山、清安、竹山、陽智、龍仁、果川、沙平院、漢江、京中等。清道至鳥嶺九處由毛利輝元負責，延豐至竹山四處由小早川隆景負責，陽智至沙平院四處由戶田勝隆(?-1594)、長曾我部、蜂須賀家政(1558-1639)等四國的軍隊負責，漢江和京中兩處由宇喜多秀家負責。<sup>135</sup>清道以下十九處，與惠瓊書狀中的十九處完全相同。由毛利輝元分擔的九處，與惠瓊記載的前九處相同。毛利輝元書狀中所謂十一處，除此九處外，另二處應是惠瓊書狀中所謂另增加的二處。<sup>136</sup>無論建造多少處行營，負擔最重的是毛利輝元。據仁同縣監趙簷的報告：「今則本縣邑內，砍伐樹木，假家排設，恣行無忌，將為久住之計。」<sup>137</sup>知朝鮮地方官對日軍建造行營，亦認為日軍是要久住，長期佔領。

日軍占領漢城後，諸將協議分治八道，各將領向各自負責的地區進兵。六月十五日小西行長占領平壤，加藤清正席捲咸鏡道。戰爭的勝利，秀吉為準備親自渡海，如上述於五月十六日下令建造行營外，又令自釜山至大明國境建置「繫城」。據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載，繫城之順序如下，釜山海浦→東萊→梁山→安湯(密陽)→新城→大丘→新城→仁同→開寧→善山→新城→尚州→咸昌→聞慶→新城→新城→忠州→陰許(陰城)→竹山→新城→湯賀→新城→新城→果川→新城→新城→開城府→新城→平山→新城→鳳山→黃州→中和→平壤→順安→肅州→定州→郭山→宣州→鐵山→龍山→義州。<sup>138</sup>其中新城為新建，其餘為利用朝鮮舊有的城邑加以改建。

<sup>134</sup> 《嚴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本)，〈豐太閤高麗陣書物〉(卷軸文書無頁碼，數位第22、28片)。

<sup>135</sup> 《毛利家文書》3，927號，〈豐臣秀吉高麗諸泊普請注文〉，頁189-192。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362-363。

<sup>136</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00。

<sup>137</sup>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頁101。

<sup>138</sup> 太田秀春，〈文祿、慶長の役における日本軍の築城観の変遷について—朝鮮邑城の利用から倭城築城への過程を中心に〉，《朝鮮學報》，181輯(奈良，2001.10)，頁62-67。

穩固釜山至義州的兵站線，可以確保日軍占領朝鮮半島，更且進兵大明。

由於戰爭失利，加上與明和談，文祿二年四月十八日開始，日軍陸續從漢城撤退，並集結半島南海岸。根據同年五月一日秀吉的朱印狀，秀吉指示東自西生浦西至熊川，由各軍負擔，營建十八個倭城。<sup>139</sup>將釜山倭城、熊川倭城、西生浦倭城連成一線，成為三大防禦圈。五月二十日的朱印狀，更預定將築城的範圍擴大到熊川以西，<sup>140</sup>目的是準備進攻全羅道。但六月二十八日攻陷晉州城後，加上與明交涉和談，熊川以西的築城規劃因此中止。倭城的建造從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費時一個半月完成。日軍在朝鮮半島南海岸和要地建造倭城，以此作為軍事據點，貯藏兵糧、武器。至文祿四年(1595)，秀吉仍命令諸將在城的周圍耕作、屯田，<sup>141</sup>其欲割取朝鮮領土及永久佔領的野心，並未因戰爭失利而放棄。

慶長二年秀吉再入侵朝鮮，此次目標是占領朝鮮南半部。三月開始，黑田長政等軍隊進入朝鮮，並在東萊、機張等地築城。至十月，為確保慶尚道，加藤清正開始築蔚山城。<sup>142</sup>此外，有黑田長政築梁山城、島津義弘築泗川城、吉川廣家築固城等。延長約六十里，成一弧形。<sup>143</sup>築城的目的，是要永久駐留。秀吉欲占領朝鮮領土的範圍雖大為退縮，但此一政策始終不變。

## 五、結論

秀吉對琉球、印度、菲律賓、高山國，均明確要求其朝貢，但態度略有不同。如視琉球如同國內諸侯，加以課賦役。印度若來修好，日本則允

<sup>139</sup>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447-450。〈朝鮮国城々仕置之事〉，《征韓錄》，卷2，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頁187-190。

<sup>140</sup> 《島津家文書》2，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覆刻)，家わけ第16，955號，〈豐臣秀吉朱印狀案〉，頁217。

<sup>141</sup>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頁254-255。

<sup>142</sup> 《清正記》，收入近藤瓶域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出版部，1928) 15冊，卷3，頁735。貫井正之，《豐臣政權の海外侵略と朝鮮義兵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205-206。中野嘉太郎，《加藤清正傳》，頁184-185。

<sup>143</sup> 杉村勇次郎，《豐太閤朝鮮役》(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22)，頁239。

許其商賈往來。對菲律賓和高山國則威脅若不朝貢，將出兵征討，但促高山國入貢的文書並未送出。其與琉球之交涉是委由島津氏，與菲律賓的交涉委由往來呂宋的商人原田喜右衛門及其伙計原田孫七郎。秀吉給這些國家的文書，主要強調其已統一日本，其為太陽之子，日本是神國。

秀吉侵略朝鮮，與其欲證明有關。天正十三年以後，秀吉給家臣、親信的文書，已屢有「唐國迄」、「唐入」、「唐立」等文字，唐即大明。秀吉欲振威大明，因此希望朝鮮臣服日本，並作為其證明的嚮導。十四年四月秀吉給毛利輝元十四條「覺」，即提到將出兵朝鮮之事。其後經由對馬宗氏，屢與朝鮮交涉，督促朝鮮派遣使節至日本，朝鮮國王終於天正十八年三月正式遣使日本。朝鮮遣使的目的是「講信修睦，以敦隣好」，但秀吉則視其為貢使，回覆的國書仍強調其出生時的奇瑞，表明欲征大明四百餘州，願顯佳名於三國，要求朝鮮「先驅入朝」，完全將朝鮮看作是屬國。秀吉出兵朝鮮的原因有各種說法，但朝鮮拒絕作「證明嚮導」，應是最直接的動機。

日軍攻陷漢城後採八道分治，各道支配者調查占領地的生產，定稅額收稅納貢，掌握米糧，以確保軍隊久駐。又，在各佔領地施行同化政策，如普及日語，同化朝鮮風俗等。此外，秀吉令諸將在釜山與漢城間建造行營，在釜山與義州間築造「繫城」。一方面為自己親自渡海作準備，另一方面則穩固兵站線以利進兵大明。但戰事失利加上與明和談，文祿二年四月日軍從漢城撤退至半島南海岸，並且東自西生浦西至熊川營建十八個倭城作為軍事據點，貯藏兵糧武器，在城的周圍耕作、屯田，欲長期駐留。慶長二年再入侵朝鮮，此次目標僅在占領朝鮮南部。<sup>144</sup>軍隊進入朝鮮後隨即築城，目的仍是欲永久支配。秀吉野心在證明，文祿之役軍事失利後，仍不放棄要朝鮮割地。慶長之役僅佔領朝鮮半島南部，範圍大為縮減，但永久支配朝鮮的政策不變。

這場侵略朝鮮的戰爭，江戶時代有正反兩面的評價。如貝原益軒(1630-1714)認為：

<sup>144</sup> 小西行長與沈惟敬極力交涉，以朝鮮王子到日本謝罪消解秀吉不滿避免戰爭，結果不成，因此有慶長之役，此戰役是要懲罰朝鮮而出兵。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頁119。

用兵有五，曰：義兵，曰：應兵，曰：貪兵，曰：驕兵，曰：忿兵。五之中，義兵與應兵君子之所用也。……曩昔豐臣氏之伐朝鮮也，可謂貪兵兼驕與忿，不可為義兵。<sup>145</sup>

他否定秀吉用兵朝鮮。山鹿素行(1622-1685)則認為：

征伐朝鮮之心，……況征，正也。以我之正，正人之不正，謂征。秀吉有何正，正高麗之不正也。<sup>146</sup>

即肯定秀吉侵略朝鮮的正當性。十八世紀的學者不少肯定秀吉，如本居宣長(1730-1801)認為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是偉業，稱讚秀吉將皇國之光照耀高麗、唐土。<sup>147</sup>林子平(1738-1793)於《海國兵談》言：

神功皇后使三韓臣服，太閤討伐朝鮮，迄今世服從本邦，皆武德所光耀也。<sup>148</sup>

將朝鮮看作當時也服屬日本，這都是神功皇后征服三韓，豐臣秀吉討伐朝鮮等威武光耀的結果。本多利明(1744-1821)於〈經世秘策〉言：

秀吉經昇關白，其後讓關白職予秀次，自稱太閤，古今獨步之大量，日本均平。……已攻朝鮮，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六十三歲薨去。……若長壽，有支那應為日本屬國之勢。<sup>149</sup>

他強調豐臣秀吉若長壽，則中國也有可能成為日本的屬國，對秀吉侵略朝鮮予以肯定。

幕末面對海防問題，征服朝鮮的意識增高。近代以後進行對外擴張，這些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致使秀吉侵略朝鮮這場戰爭更受肯定。明治政府加以宣傳、利用，並將其作為殖民朝鮮、侵略亞洲的先導。這種「侵略朝鮮史觀」，直至二次大戰後才改變，日本歷史學界也做各種檢討。

<sup>145</sup> 柳成龍，《懲寇錄》，〈序〉，頁259-560。

<sup>146</sup> 山鹿素行，《山鹿隨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東京：岩波書店，1940)，第11卷，頁295；296。

<sup>147</sup> 本居宣長，《馭戎慨言》(1796年刊本)，下之卷下，頁117。日本將朝鮮亦稱為唐。

<sup>148</sup> 林子平，《海國兵談》，收入學藏會編，《林子平全集》(東京：生活社，1943)第1冊，16卷，頁349。

<sup>149</sup>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卷下，收入塚谷晃弘、藏並省自校注，《日本思想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70)第44冊，頁25、36。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1. 《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  
*Seikan roku*, in Kitagawa Tetsuzō kōchū, *Shimazu shiryō shū*, Tōkyō: Jinbutsu Ōraisha, 1966.
2. 《小山文書》2，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真帳。  
*Oyama bunsho*, 2,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shashin chō.
3. 《小早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覆刻，家わけ第11。  
*Kobayakawake bunsho*, 1,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1, fukkoku, iewake dai 11.
4. 《毛利家文書》3，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8。  
*Mōrike bunsho*, 3,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fukkoku, iewake dai 8.
5. 《白川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4。  
*Shirakawa bunsh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eishahon, 4.
6. 《伊達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覆刻，家わけ第3。  
*Dateke bunsho*, 1,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9, fukkoku, iewake dai 3.
7. 《吉川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9。  
*Kikkawake bunsho*, 2,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fukkoku, iewake dai 9.
8. 《吉川家譜》，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  
*Kikkawa kaf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9. 《妙滿寺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Myoumanji bunsh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eishahon.
10. 《松浦文書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謄寫本，2。
- Matsuura bunsho rui*,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tōshahon, 2.
11. 《南行雜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1。
- Nan xing za l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1。
12. 《相良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5。
- Sagarake bunsho*, 2,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fukkoku, iewake dai 5.
13. 《島津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覆刻，家わけ第16。
- Shimaduke bunsho*, 2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82, fukkoku, iewake dai 16.
14. 《清正記》，收入近藤瓶域編，《改定史籍集覽》15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8。
- Kiyomasa ki*, in Kondō Heijō, hen, *Kaitei shiseki shūran*, dai 15 satsu, Tōkyō: Kondō Shuppanbu, 1928.
15. 《組屋文書》，收入小浜市史編纂委員會編，《小浜市史》，諸家文書編一，福井縣小浜市：小浜市役所，1979。
- Kumiya bunsho*, in Obama Shishi Hensan Inkai, hen, *Obama shishi*, Shoke monjo hen 1, Fukui-ken Obama-shi: Obama Shiyakusho, 1979.
16. 《喜連川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3。
- Kitsuregawa bunsh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 jo shū zō, eishahon, 3.
17. 《鍋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Nabeshima bunsh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 jo shū zō, eishahon.
18. 《嚴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本。
- Itsukushima bunsh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 jo shū zō, shahon.
19. 大關定祐，《朝鮮征伐記》，東京：國史研究會，1916。
- Ōzeki, Sadasuke. *Chōsen seibatsuki*, Tōkyō: Kokushi Kenkyūkai, 1916.
20. 山鹿素行，《山鹿隨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東京：岩波書店，1940。
- Yamaga, Sokō. *Yмага zui hitsu*, in Hirose Yutaka, hen, *Yamaga Sokō zenshū · shisō hen*,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40.
21. 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編，《武家事紀》，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1916。

- Yamaga Sokō Sensei Zenshū Kankōkai, hen. *Buke jiki*, Tōkyō: Nisshin insatsu kabushikigaisha, 1916.
22.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近藤圭造編，《改定史籍集覽》第21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
- Fu cho sen nin. *Zoku zen ringoku hōki*, in Kondō Keizō, hen, *Kaitei shiseki shūran*, dai 21 satsu, Tōkyō: Kondō Shuppanbu, 1924.
23. 天荆，《西征日記》，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統々群書類從》第3冊，東京：統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Tenkei. *Seisei nikki*, in Kokusho Kankōkai, henchō, *Zokuzoku gun sho ruijū*, dai 3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0.
24.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
- Kusaka, Hiroshi, hen. *Hō Kō ibun*, Tōkyō: Hakubunkan, 1914.
25.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本多利明、海保青陵》，收入塚谷晃弘、藏並省自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44冊，東京：岩波書店，1970。
- Honda, Toshiaki. “Keiseihisaku,” *Honda Toshiaki, Kaiho seiryō*, in Tsukatani Akihiro, Kuranami Seiji, kōchū, *Nihon Shisō Taikei*, Tōkyō : Iwanami Shoten, 1970.
26. 本居宣長，《馭戎慨言》，1796年刊本。
- Motoori, Norinaga. *Karaosame no uretamigoto*, 1796 kan hon.
27. 申昞用，《再造藩邦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 Shen, Jiongyong. *Zai zao fan bang zhi*, Taipei: Gui ting chu ban she, 1980.
28. 吉田蒼生雄譯注，《武功夜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
- Yoshida, Tamio, zenyaku. *Bukō yawa*, Tōkyō : Shin Jinbutsu Ōraisha, 1987.
29. 李廷範，《四留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韓國文集叢刊》，第5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
- Yi, Chōngam. *Saryujae chip*,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Han’guk munjip ch’onggan*, 51, Sōul: Kyōngin Munhwasa, 1996.
30. 村上直次郎，《豐臣秀吉フリッピン諸島并に臺灣の入貢を促す》，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富山房，1905。
- Murakami, Naojirō. “Toyotomi hideyoshi Fuirippin shotou narabi ni Taiwan no nyū kō wo unagasu,” in Shigakkai, hensan, *Kōan Bunroku seisen iseki*, Tōkyō: Fuzanbō, 1905.
31.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豐太閤真蹟集》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 *Hō Taikō shinsekishū*, zy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6.

32. 林子平，《海國兵談》，收入學藏會編，《林子平全集》第1冊，東京：生活社，1943。  
Hayashi, Shihei. *Kaikoku heidan*, in Gaku zō kai, hen, *Hayashi Shihei zenshū*, dai 1 satsu, Tōkyō: Seikatsusha, 1943.
33. 林恕，《續本朝通鑑》，東京：國書刊行會，1919。  
Hayashi, Harukatsu. *Zoku honchō tsūkan*, Tōkyō: Kokusho Kankōkai, 1919.
34.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中，明曆四年(1658)刊本。  
Hayashi, Razan. *Toyotomi hideyoshi fu*, tyū, Meireki 4 (1658) kan hon.
35. 近衛信尹著、近衛通隆等校訂，《三藐院記》，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5。  
Konoe, Nobutada, cho, Konoe Michitaka, tō kōtei, *Sanmyakuin ki*,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5.
36. 柳成龍，《懲毖錄》，收入牛平漢等編，《王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  
Yu, Sōngnyong. *Chingbirok*, in Niu Pinghan, deng bian, *Ren chen zhi yi shi liao hui ji*,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1990.
37. 英俊等編，《多聞院日記》，收入竹內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京都：臨川書店，1994。  
Eishun, tō hen. *Tamon'in nikki*, in Takeuchi Rizō, hen, *Zō ho zoku shiryō taisei*, Kyōto: Rinsen Shoten, 1994.
38. 徐光啟，《海防迂說》，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30冊，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8。  
Xu, Guangqi. "Hai fang yu shuo," in Chen Zilong, deng bian, *Huang Ming jing shi wen bian*, di 30 ce, Taipei: Tai lian guo feng chu ban she, 1968.
39. 徐學聚，《初報紅毛番疏》，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26冊。  
Xu, Xueju. "Chu bao hong mao fan shu," in Chen Zilong, deng bian, *Huang Ming jing shi wen bian*, di 26 ce, Taipei: Tai lian guo feng chu ban she, 1968.
40.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修正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Kuksa P'yōnch'an Wiwōnhoe. *Sōnjo sujōng sillok*. Sōul: Tongguk Munhwasa, 1957.
41. 國史編纂委員會，《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Kuksa P'yōnch'an Wiwōnhoe. *Sōnjo sillok*. Sōul: Tongguk Munhwasa, 1957.
42. 堀正意，《朝鮮征伐記》，收入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通俗日本全史》第20冊，東京：早稻田大學，1913。  
Hori, Masai. *Chōsen seibatsuki*. in *Tsūzoku Nihon zenshi*, dai 20 kan. Tōkyō: Waseda Daigaku Shuppanbu, 1913.

43.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29冊。  
Huang, Chengxuan, "Tiao yi hai fang shi yi shu," in Chen Zilong, deng bian, *Huang Ming jing shi wen bian*, di 29 ce, Taipei: Tai lian guo feng chu ban she, 1968.
44. 諸葛元聲輯、商濬校，《兩朝平攘錄》，收入牛平漢等編，《王辰之役史料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Zhuge, Yuansheng, ji; Shang Jun, jiao. *Liang chao ping rang lu*. in Niu Pinghan, deng bian, *Ren chen zhi yi shi liao hui ji*.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1990.
45. 賴山陽，《邦文日本外史》，東京：京文社，1931。  
Rai, San'yō. *Hōbun Nihon gaikōshi*. Tōkyō: Keibunsha, 1931.
46.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  
Gu, Yanwu. *Tian xia jun guo li bing shu*. Taipei: Guang wen shu ju, 1979.
47. 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5。  
Tsuji, Zennosuke. *Rokuon nichiroku*. Tōkyō: Taiyōsha, 1935.
48. フロイス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Furoisu, cho, Matsuda Kiichi, Kawasaki Momota, yaku. *Nihon shi*.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1977.
49. モンタヌス著、和田萬吉譯，《日本誌》，東京：丙午出版社，1925。  
Montanusu, cho, Wada Mankichi, yaku. *Nihon shi*. Tōkyō: Heigo Shuppansha, 1925.

## (二) 專書

1. 山本正誼，《新刊島津國史》，鹿兒島：鹿兒島縣地方史學會，1972。  
Yamamoto, Seigi. *Shinkan shimadu kokushi*. Kagoshima: Kagoshimaken chihou shigaku kai, 1972.
2.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I.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5.
3.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II.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9.
4.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衆、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東京：文獻出版，1993。  
Nakazato, Norimoto.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kō to minshū, Bunroku no eki*

- (*Imujin Ueran*): *Nihon minshū no kunō to Chōsen minshū no teikō*. Tōkyō : Bunken Shuppan, 1993.
5. 中野嘉太郎，《加藤清正傳》，熊本：新潮社，1979。  
Nakano, Yoshitarō. *Katō Kiyomasa den*. Tōkyō: Ryūbunkan, 1909.
  6. 北島万次，《朝鮮日日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会社そしえて，1982。  
Kitajima, Manji. *Chōsen nichinichiki, Kōrai nikki: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ryaku to sono rekishiteki kokuhatsu*. Tōkyō : Soshiete, 1982.
  7. 北島万次，《豊臣政権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8。  
Kitajima, Manji. *Toyotomi seiken no taigai ninshiki to Chōsen shinryaku*. Tōkyō : Azekura Shobō, 1998.
  8. 池内宏，《文祿慶長の役》正編第一，東京：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1914。  
Ikeuchi, Hiroshi. *Bunroku Keichō no eki*. Seihen Dai 1. Tōkyō: 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Kaisha, 1914.
  9. 池内宏，《文祿慶長の役》別編第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復刊。  
Ikeuchi, Hiroshi. *Bunroku keichō no eki*. Beppen dai 1.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87, fukkan
  10. 杉村勇次郎，《豊太閤朝鮮役》，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22。  
Sugimura, Yūjirō. *Hō Taikō Chōsen no eki*. Tōkyō: Nihon Gakujutsu Fukyūkai, 1922.
  11. 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經略》，東京：白揚社，1939。  
Kyōguchi, Motokichi. *Hideyoshi no Chōsen keiryaku*. Tōkyō: Hakuyōsha, 1939.
  12. 岡本良知，《豊臣秀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  
Okamoto, Yoshitomo. *Toyotomi hideyoshi*.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1936.
  13. 武内博編，《來日西洋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1989。  
Takeuchi, Hiroshi, hen. *Rainichi Seiyō jinmei jiten*. Tōkyō: Nichigai Asoshiētsu, 1989.
  14. 海老沢有道，《日本キリシタン史》，東京：塙書房，1972。  
Ebisawa, Arimichi. *Nihon Kirishitan shi*. Tōkyō: Hanawa Shobō, 1972.
  15.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  
Sanbō Honbu, hen. *Nihon senshi: Chōsen no eki*. Tōkyō: Murata Shoten, 1978.
  16. 張玉祥，《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  
Zhang, Yuxiang. *Shokuhō seiken to Higashi Ajia*. Tōkyō: Rokkō Shuppan, 1989.
  17. 貫井正之，《秀吉が勝てなかった朝鮮武將》，東京：同時代社，1996。  
Nukii, Masayuki. *Hideyoshi ga katenakatta Chōsen bushō*. Tōkyō: Dōjidaiisha, 1996.

18. 貫井正之，《豐臣政權の海外侵略と朝鮮義兵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6。  
Nukii, Masayuki. *Toyotomi seiken no kaigai shinryaku to Chōsen gihei kenkyū*. Tōkyō: Aoki Shoten, 1996.
19. 鈴木良一，《豐臣秀吉》，東京：岩波書店，1954。  
Suzuki, Ryōichi. *Toyotomi Hideyosh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54.
20. 徳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朝鮮役》上卷，東京：民友社，1921。  
Tokutomi, Ichirō. *Kinsei Nihon kokumin shi, Chōsen no eki*. I. Tōkyō: Min'yūsha, 1921.

### (三)論文

1. 三上參次，〈文祿役に於ける講和條件〉，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  
Mikami, Sanji. “Bunrokueki ni okeru kōwa jōken,” in *Shigakkai, hensan, Kōan Bunroku seisen iseki*, Tōkyō: Shigakkai, 1905.
2. 太田秀春，〈文祿、慶長の役における日本軍の築城観の変遷について——朝鮮邑城の利用から倭城築城への過程を中心に〉，《朝鮮學報》，第181輯(奈良，2001.10)，頁51-86。  
Ōta, Hideharu. “Bunroku - Keichou no eki ni okeru Nihongun no chikujou kan no hensen nitsuite: Chōsen yūjō no riyō kara Wajō chikujō he no katei wo chūshin ni,” *Chōsen gaku*, 181 (Nara, 2001.10), 51-86.
3. 田中義成，〈豊太閤の外征に於ける原因に就て〉，《史學雜誌》，第16卷第8號(東京，1905.08)。  
Tanaka, Yoshinari. “Hō Taikō no gaisei ni okeru gen'in nitsuite,” *Shigaku zasshi*, 16.8 (Tōkyō, 1905.08).
4. 村上直次郎，〈呂宋の入貢を促したる秀吉の書翰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36卷第5號(東京，1925.05)。  
Murakami, Naojiro. “Ruson no nyūkō wo unagashitaru Hideyoshi no shokan nitsuite,” *Shigaku zasshi*, 36.5 (Tōkyō, 1925.05).
5. 岩生成一，〈豊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38卷第8號(東京，1927.08)。  
Iwao, Seiichi. “Toyotomi Hideyoshi no Taiwan seibatsu keikaku nitsuite,” *Shigaku zasshi*, 38.8 (Tōkyō, 1927.08).
6. 岩沢愿彦，〈秀吉の唐入りに関する文書〉，《日本歴史》，第163號(東京，1962.01)，頁73-75。

- Iwasawa, Yoshihiko. "Hideyoshi no karairi ni kansuru bunsho," *Nihon rekishi*, 163 (Tōkyō, 1962.01), 73-75.
7. 松田毅一，〈慶長二年呂宋国宛豐臣秀吉書狀〉，《日本歴史》，第164號(東京，1962.02)。
- Matsuda, Kiichi. "Keichou ninen Rusonkoku ate Toyotomi Hideyoshi shojō," *Nihon rekishi*, 164 (Tōkyō, 1962.02).
8. 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史學》，第4卷第3號(東京，1925.08)。
- Takeda, Katsuzo. "Hakushaku sōke shozō kōbunsho to Chōsen jin," *Shigaku*, 4.3 (Tōkyō, 1925.08).
9. 芝葛盛，〈文祿役に於ける佔領地收税の一斑〉，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
- Shiba, Kazumori. "Bunrokueki ni okeru senryōji shūzei no itsupan," in *Shigakkai, hensan, Kōan Bunroku seisen iseki*, Tōkyō: Shigakkai, 1905.
10. 阿部愿，〈豐臣氏征韓の趣義を究めて其動機に及ぶ〉，《史學雜誌》，第17卷第1號(東京，1906.01)。
- Abe, Gan. "Toyotomi shi seikan no shugi wo kiwamete so dōki ni oyobu," *Shigaku zasshi*, 17.1 (Tōkyō, 1906.01).
11. 藤田明，〈豐太閣所持と傳へらるる扇面及び朝鮮役に用ゐられたる地圖〉，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
- Fujita, Akira. "Hō Taikō shoji to tsutaerareruru senmen oyobi Chōseneki ni mochiiraretaru chizu," in *Shigakkai, hensan, Kōan Bunroku seisen iseki*, Tōkyō: Shigakkai, 1905.
12. 辻善之助，〈豐臣秀吉の南方經營〉，收入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
- Tsuji, Zennosuke. "Toyotomi Hideyoshi no nanpō keiei," in *Tsuji Zennosuke, Zōtei Kaigai kōtsū shiwa*, Tōkyō: Naigai Shoseki Kabushiki Kaisha, 1930.

## **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 of Korea**

Lo, Lee-hs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 of Korea lasted for six years and eight months, from 1592 to 1598. Hideyoshi believed that a divine Japan, unified under his rule, was entitled to receive tributary offerings from other states such as Okinawa, Kouzankoku (Taiwan), Indi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such, his invasion of Korea can be seen as part of his larger intent to subdue the Ming Dynasty.

After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Seoul, they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assimilation over all occupied areas. In order to secure their supply lines, they constructed the city of Tunagi Shiro in the area between Pusan and Uji. And in 1593, 18 Japanese cities were established as military strongholds. The cities were established with a view to enabling a long term Japanese presence, but shortly afterwards Japanese military defeat was followed by the withdrawal of the Japanese army to the southern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n the Japanese army re-invaded Korea in 1597, their professed goal was the occupation of southern Korea. However, on arrival they immediately constructed a Japanese city in line with their unchanging policy of long-term domination of Korea.

There we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sessments during the Edo Era about the invasion of Korea. However, when Japan undertook foreign expansion in more modern times, 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 of Korea became more acceptable. Hideyoshi's invasion of Korea was promot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 who were keen to show the invasion as a precursor of their colonization of Korea and invasion of Asia..

**Keywords: Toyotomi Hideyoshi, Tunagi Shiro, Pusan, Uji, Japanese cities**